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美] 马立博 著
关永强 高丽洁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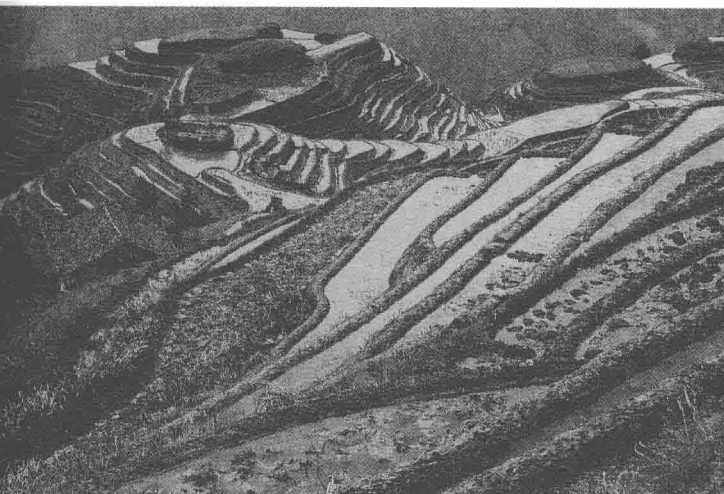
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中国环境史：
从史前到现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美] 马立博 著
关永强 高丽洁 译



中国环境史：
史前到现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美) 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ISBN 978-7-300-21578-5

I. ①中… II. ①马…②关…③高… III. ①环境-历史-研究-中国 IV. X-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694 号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

[美] 马立博 著

关永强 高丽洁 译

Zhongguo Huanjing Shi: Cong Shiqian dao Xianda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36.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35 000

定 价 8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王利华

马立博 (Robert B. Marks) 教授新著——《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的中译本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蒙著者和译者抬爱，命为作序，我深感惶恐。

最近两年我在中国环境史课堂上一直向同学重点推荐该书，还曾与研究生们一起专门研读，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还学到了不少环境史的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受益良多。原想多谈几点学习体会，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则因为“译者前言”已经详细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也中肯地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偏颇，无须多作重复；二则慑于相关问题之高度复杂性，深恐率尔妄语徒增繁赘，还可能曲解原意对读者造成误导。思忖再三，决定只简单地赘言几句，以示隆重推介之意。

最近几年，我国环境史研究迅速热起来，修习相关课程的同学明显增多，越来越多的社会读者希望多了解一些中国环境史。遗憾的是，这门新史学的知识体系尚处于艰苦的构建之中，目前国内尚未推出一个上下贯通、内容综合、繁简适中的读本。这部出自外国学者手笔的新著，不论对历史学、环境科学专业的同学还是对一般读者，都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

该书之撰成得益于作者多年的教学积累，因此它看起来更像是一本纲要或概论之类的教科书。但个人认为：作者的叙事手法、问题意识和思想观点都有颇多新意，也很值得中国环境史同人认真品读。马立博教授是一位严谨、认真并且擅长宏观构思的学者，他所构设的中国环境史叙事解说框架可能还不非常完美，但很具有创造性，值得借鉴。该书以长时分段建章，以重要事项和问题立目，勾勒出了自远古至当代中国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演变的历史脉络，叙述、探讨了非常广泛而复杂的历史环境问

题，谋篇布局匠心独运，起承转合洒脱流畅。这看似容易，实则艰辛，若非自己曾经或者正在编纂这样一部上下贯通、内容综合的中国环境史，很难想象作者在没有任何前例可循的情况下为了设计框架、选择材料而来回踱步、往复沉吟的苦思情景。

该书和不久之前刚刚被译、出版的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属于两个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著述, 两者各有建树。作为老一代西方中国学界之翘楚和西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开创者, 伊懋可教授在提出问题、解读史料等方面或许更显功力, 《大象的退却》一书的专题研究性质允许他可以更自由、恣肆地展开叙事和论说; 马立博教授的这本书, 则因具有“通史”性质, 乃不得不在遵循中国历史时间表的前提下, 渐次展开自然与社会互动的空间过程, 所牵连的历史现象和问题远为广泛而且复杂, 在框架设计和故事选择两个方面都更加费心劳神, 更容易顾此失彼。马立博无疑是成功的, 他的这本书更具综合性、汇通性, 更具有自然与社会历史的交互融入感。按照学术发展的常规趋向, 这两本著作似乎反映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两个逻辑阶段: 前者重在专题开拓, 后者重在整体汇通。整体汇通, 乃是以大量专题研究作为基础的。

但这并不是说该书没有任何开拓和创见。事实上, 作者不仅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伊懋可的著述), 而且提出了很重要的新课题, 关于具体问题的论说更是时有新见。例如, 他不赞同把中国环境史仅仅描述成数千年人与野生动物的战争史, 而是高度重视汉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生态关系, 以很大篇幅讲述了汉人与众多其他族群在生计体系、资源利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解说了中国辽阔大地上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系如何逐渐走向“单一化”, 这可能是该书最重要的一个开拓, 对我们探讨和编纂中国环境史最具启发性。当然, 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作者的观点。由于西方殖民史研究思想话语的影响, 其关于汉人与其他民族彼此接触、互相融合以及农耕逐渐替代其他生业方式的故事叙述带有过分浓烈的“铁”、“血”腥味, 亦显然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再如, 作者注意到数千年中国环境资源破坏与农业持续发展和土地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现象, 曾于多处讲述了地力维持和肥料问题, 虽非首创, 但持论较为中肯。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马立博教授自然更熟悉西方学术的传统、动态和成果，对该书故事发生之地的本土学术则未免有些隔膜，因而他对相关西文论著可谓广征博引，对中文论著则几乎完全未予引用。这自然有些遗憾，一些本可讲述的故事因此付诸阙如。更重要的是，作者成长于西方学术环境，其研究视角、学术思想、话语概念、问题意识乃至具体观点，无疑都深受西方环境的熏染和影响，该书的一些偏颇大多与此有关。例如，作者对20世纪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给予了一定的历史同情，这是值得欣赏的；但他对当代中国环境及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叙述相当暗涩，不能不令人猜想是受了“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这些论调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显著地反映在许多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和论著之中。尽管本书的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甚至并不赞同“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但他叙述当代中国环境的材料大多援引自西方人士的报道和论著，这些报道和论著有不少带有明显偏见，或多或少地反映于该书。这是中国读者不能不予以特别留意的。

不过，有些情况从一个角度看可能是缺陷，而从另一角度看却并非完全是坏事。例如，其中引用的大量西文论著，适可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他者”视角中的中国历史镜像往往偏离实际，特别是一些人在主观上就爱“斜视”中国，就更有可能扭曲甚至颠倒事实真相。作为一名西方学者，马立博博采西方众家之论而撰成该书，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他者”视角中的历史镜像，通过该书反射回到故事发生之地，即便存在扭曲甚至颠倒现象，亦有可能给国内同人带来某些思想上的刺激，引起我们对一些曾被忽视的问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人要想建立自己的环境史学体系，在国际舞台上讲真相，驳谬论，消误解，正视听，就必须认真地了解“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不惮辛苦提供了多达数百、上千种西方学术文献。

环境史是一门相当年轻、但成长迅速的新史学。从全球范围来看，它已经进入了国际史学主流。中国环境史研究相对晚起，尚需在思想理论、研究方法和编纂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艰苦摸索。在设计中国环境史的宏大叙事框架方面，马立博教授率先做了尝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相信中国同人拥有宽阔的胸怀和谦逊的态度给予该书以中肯评价。对于书中存在

的缺陷特别是思想偏颇，相信广大读者也有足够的辨别能力。

谨为小序，向马立博教授和两位才华横溢的译者——关永强博士和高丽洁博士表示祝贺！

2015年5月8日撰于空如斋

译者前言

在之前出版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一书中，马立博教授曾援引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来阐释环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中时段社会史和短时段事件史的研究思路已经被学界广泛应用，而长时段中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则少有追随者。本书就是这样一部长时段的环境史研究。大部分社会经济史著作通常都会在开头部分介绍所研究地区的自然地理情况，但这些大都是将环境作为研究的背景而作的静态描述；而本书则在广泛吸纳西方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上各时期、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联系起来，对从史前到现代的中国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动态考察。

本书内容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通常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行组织的，引用材料虽然很多，但叙述上比较顺畅（翻译中的舛漏则是我们译者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干扰读者的阅读，在这里只就我们认为书中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观点、与作者意见不尽一致之处、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环境史学者伊懋可的不同之处以及译者对环境史研究的一点浅见作一些介绍，谨供读者参考。

—

与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主要关注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和赞赏农业对人类社会的积极贡献不同，环境史更多关注的是自然和生态的变迁，而认为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减少。本书即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为农业生产和提供燃料、木材而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而森林砍伐和水利灌溉工

程，又共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进而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退化；发达的农业在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并且在19世纪以后变得日益不可持续。

作者认为，在中国数千年来农业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政府在战国时期就意识到了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意义，并建立了小农家庭经营、政府从农家收税的基本制度，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农业发展和环境变迁。汉朝开创并被后世所沿用的屯田政策，就是通过政府的军事保护和家庭农场来共同把边疆地区新的陌生的自然环境转变为自己已经熟悉的环境，从而增强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能力。在政府和农业家庭共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市场和私人产权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市场体系和劳动分工可以放大或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导致某些地区极为严重的生态单一化；市场体系也可以把单个地区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当代的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就加剧了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污染。

作者还指出，虽然春秋时期就出现了道法自然、重视土地管理与水土保持以及节制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观念，道教、儒教和佛教也都表达了对动物命运和福祉的忧虑，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环保思想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却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与人口、经济和政治等物质因素相比，对自然的爱恋和对生态退化后果的认知并没能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而这也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思。

二

作为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如前所述，本书是在参考和引用大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在参考和引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携带了这些研究的观点，而有些观点则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书中经常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认为历代政府之所以采取屯田政策来开拓边疆，是因为统治者认为彻底解决土著民族威胁的办法就是

把他们的生态环境改造成汉人的农田，从而从生态基础上教化和塑造这些蛮夷。书中经常出现汉民族的农业扩张带来了与土著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似乎汉人是在和欧洲人殖民美洲一样消灭土著民族；而对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和个别土著民族在游耕之后补种植被的过度阐释也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土著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更加适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汉族取而代之的农业生产则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然而事实上，正如本书中所述，当人们进入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并与周围互动、随后双方都因此而发生改变时，对身份的认知也会随之而发生游移。汉人在进入新的地区之后，也会向当地的土著民族学习生产和生活经验，变化的不仅是土著民族，也包括汉人，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或者陈垣先生所说的“华化”，而绝不是欧洲人曾经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屠杀和血腥殖民。如果读者们仔细阅读本书，就会发现书中同样还明确提到，暴力事件和土地掠夺并不仅仅发生在汉人与土著民族之间，土著民族相互间的冲突也非常频繁；土著民族并未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并不更加有利于生态多样性的保持，而只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人口、市场压力还不够大，第四章中的四川诺苏人、第七章中西藏地区 and 三江并流保护区采取游耕生产的很多民族以及蒙古草原的退化，都表明了这一点。

而书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达，关键在于前一种话语体系的出现源自于作者大量引用的濮德培、约翰·荷曼、柯娇燕、狄宇宙、罗友枝、米华健、纪若诚、詹姆斯·雷尔登-安德森、林蔚、费每尔、贝杜维、蔡红、邵式柏等“新清史”学者的著作，而根据美国学者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近期的一篇文章，环境史正在成为美国“新清史”的研究趋势。

对“新清史”的形成及其影响，国内已经有了很多专业学者的研究，我们无须赘语，这里只将“新清史”潮流与近代日本的东洋史学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早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扩张之初，就通过一些学者提出和散布各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观点，包括白鸟库吉的“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矢野仁一的“满蒙藏非中国”、“中国非国论”，有高岩的“满洲独立论”等，恶意夸大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

间的冲突和差异，主张把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小国，这些充分体现了学术为政治先行、以学术为名而行意识形态之实的特点，正如龚自珍所说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清史”潮流，则再度夸大了清代的满族特性和民族间的差异和矛盾，主张用涵化取代汉化，以“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种政治互动”取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于这类观点，相信读者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三

很多读者可能都会将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学家伊懋可进行比较，这里也简单提一下我们对这两位学者及其观点的一些初步的看法。

首先，马立博教授更接近于贡德·弗兰克和彭慕兰的观点，很多学者将他也归入了加州学派。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一书中曾指出，从生态角度而言，前近代的中国和英国都处于旧生态体制之中，面临着同样的生态压力，如果不是美洲殖民地的资源和煤炭的开发，英国也不会发生工业革命，而将遭遇19世纪中国同样的命运；在本书中他也认为中国农业虽然在19世纪以后面临着严重的养分流失，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实现了高度成功的养分循环，这使得前近代的中国农业系统拥有远远超过欧洲的非凡的可持续性。而伊懋可教授则认为中国经历了“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在前近代已经面临了比欧洲严重得多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同时还认为导致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并不在于生态约束，而在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其次，伊懋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将自然界或者荒野与人类分开来讨论并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的思想，所有的“自然”都被看作人类社会的工具，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可能会被明智地开发利用，也可能被不负责任地滥用。而马立博教授则认为，与欧洲长期以来将自然与人类截然分开的文化不同，中国对自然的看法是非常复杂而且处于动态之中的，中国人既希望主宰自然，又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歉疚，道教和佛教中都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珍爱动物和自然的思想和主张。2014

年5月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报告中，马立博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欧洲人仍然认为物种的灭绝是自然进程和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一些物种的消失。

四

环境史的研究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了解环境变迁的来龙去脉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即透过历史的进程、借助相对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各种环境议题，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中探讨环境变迁的原因、影响和保护环境的办法，既不要将21世纪的环境保护观念强加到古人的身上来对他们求全责备，也应该注意从当前的国情和世情出发，看待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我们当然绝不能低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状况，也不能忽视一些盲目推崇所谓科学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做法，但正如书中所述，我们同样也需要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中国放到数千年的环境演变和从旧能源体制向新能源体制转变的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事实上，我国在高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一直都致力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十一五”期间已经实现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9.1%，并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下降16%。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先污染再治理的过程，而发达国家目前环境污染减轻和森林砍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污染工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对东南亚、巴西等雨林的肆意砍伐。如果脱离这些具体的国情和世情，片面地主张环保激进主义，就可能落入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陷阱，把环境问题变成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之后又一个扼杀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新武器。

最后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本书的一项重要价值就在于广泛参考了英语世界有关中国环境史及相关议题的大量论著，全书引用的注释超过一千条，中国读者可以通过本书较全面地了解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于书中引用的文献，凡我们了解到有中译本可供参考的，均在注释中作了提示，以便读者参阅。同时，为照顾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方便读者利用，我们将原书的书后注改为脚注，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到书后“索引”中的

个别词条。我们也希望本书的译介能够有助于中国读者博参群议，以资博识，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和理性环境保护思想的传播。

本书的两名译者分别从事经济史和环境科学研究，都不是历史学出身。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马立博教授和王利华教授的热情帮助，马立博教授还对少数几处文字进行了调整，以免引起歧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吕鹏军编辑也对本书进行了极为细心的校对，这里一并致谢。但限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译文中应该还有很多不足甚至错误或遗漏之处，这些都是译者的责任，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4年7月于南开大学

致 谢

本书是我所有著作中工程最庞大、内容最复杂的一本，虽然作者一项只署了我的名字，但如果没有众多学者和机构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 xix

我首先要特别感谢阅读全书初稿并提出批评和建议的 David Bello, Steve Davidson, Anne Kiley, John McNeill 和 Mark Selden; 以及无数通过电邮、电话或在不同时间、场合的交谈中帮助我解决资料来源或资料阐释问题的学者, 包括 David Bello, David Christian, 邓钢, Lee Feigon, Edward Friedman, Daniel Headrick, Paul Kjellberg, Peter Levelle, Joseph McDermott, Nicholas Menzies, Andrew Mertha, Ruth Mostern, Micah Muscolina, Anne Osborne, Walter Parham, Peter Purdue, Cheryl Swift, Jonathan Unger, Donald Wagner, Robert Weller, Adam Witten 和张玲; Darrin Magee 不仅惠允本书使用他博士论文中的地图, 还对其重新进行了绘制。

其他学校的一些同行学者曾热情邀请我访问并报告本书的相关研究进展。感谢 Jim Scott 邀请我在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中报告本书第六章的部分内容以及与会者们饶有兴致的讨论。感谢 Tom Lutze 和 Abby Jahiel 邀请我在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 Scott O'Bryan 邀请我在印第安纳大学介绍本书的研究成果。感谢 Edward Friedman 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研究中心邀请我报告第五章和第七章的相关内容。我曾在纪念 Maurice Meisner 治学五十年研讨会上提交过第七章的部分内容, 也感谢与会学者特别是 Tom Lutze 和 Carl Riskin 的评论。感谢 Cecily McCaffrey 在威拉姆特大学的款待。Johanna Waley-Cohen 曾邀请我参加纽约大学的会议, 虽然当时本书的样稿已经寄出, 但为会议撰写论文的过程仍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我的研究思路。

我之所以能够利用整个 2007—2008 学年撰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要感谢惠特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提供的学术休假和美国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的学术研究资助项目（HR-50349-07），以及为我目前所拥有 Richard and Billie Deihl 讲座教授职位提供的基金，感谢所有这些资金上的支持。

我也要感谢多位学界同行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和引用他们正在研究而尚未发表的成果，包括 Desmond Cheong, Hugh Clark, Jack Hayes, Jeffrey Kinzley, Peter Levelle, Tim Sedo, Elena Songster 和张玲。

过去几年来参加我中华帝国课程的同学们也曾经阅读并评论过本书相关内容的各种初稿，他们是 2008 年秋季学期的 T. C. Collymore, Cameron Cuellar, Laura Jennings, Ben Mitchell, Leah Sigler, Dillon Trites, Victor Velasquez; 2009 年秋季学期的 Melanie Abe, Andrew Choi, Matthew Evans, Bryan Herring, Korrine Hilgeman, Avinash Jackson, Brian Mao, Cody McDermott, Melissa Samarin, Chaz Smith, Katrina Thoreson, Andres Villapando, Stephen Wishon; 2010 年秋季学期的 Courteney Faught, Cookie Fuzell, Timothy Lang, Ryan Raffel, Sue Rubin, Darren Taylor, Matt Wiley。此外，我在讲授全球环境史、东亚史和近代中国史课程时也曾经使用过本书的部分内容，感谢所有曾经向我反馈他们阅读和理解本书情况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在惠特尔学院，沃德曼图书馆的 Joe Dmohowski, Mike Garabedian 和 Cindy Bessler 帮助我从世界各地查找和借阅了不计其数的图书和论文；Robert Olsabeck 使用 Excel 软件帮助我制作了书中的图表；Rich Cheatham 在胶片和制图方面的丰富经验使我在为本书电子版准备老照片时受益良多；Darren Taylor 帮助我翻译了几本中文书的目录和一些段落。惠特尔学院历史系的同事，特别是现任系主任 Elizabeth Sage 一直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并对我定期不在学校的情况予以了理解；历史系秘书 Angela Freeland 对我的帮助远不止是复印和沏茶这些事务——当然，这些事务也很重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中国分馆的程洪也帮助我在他们的馆藏中找到了一些非开架的善本书籍。

出版社的 Susan McEachern 编辑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这项研究，她不仅

阅读书稿和提出改进意见，还帮助我实现了在书中加入好几幅地图和其他图表的愿望；Janice Braunstein 负责文字编辑与校对；Susan 的助理 Grace Baumgartner 负责安排本书的出版日程；书中有几幅地图的基础图均引自 Map Resources，Josh Brock 在技术上帮助我使用 Adobe Illustrator 和 Photoshop 对地图进行了绘制和调整。感谢 Gregory Veeck，Clifton W. Pannel，Christopher J. Smith 和黄友琴允许我使用他们著作 *China's Geography: Globaliz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也由 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中的地图。

本书第七章的部分内容曾收入 *Radicalism, Revolution, and Reform in Moder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Maurice Meisner* 一书中出版过，我在这里也想感谢莱克星顿出版社允许我使用这些内容。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中的几幅插图，以及根据我之前出版并拥有版权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一书中的相关内容撰写部分段落。

很可惜，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我才知道 David Bello 那本重要的新书稿，因而来不及把相关内容纳入本书中。这本新书的名称暂定为 *Fencing in Forest, Steppe, and Mountain: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Empire in Qing China's Borderlands*，当他邀我阅读书稿时，本书正在校样当中，如果我能早点读到他的资料和深刻的见解，一定会将这些写进本书的。不过这也意味着，读者不久就会见到这本了不起的新著并将其放进阅读书目之中。

没有上述学者和他们的帮助，本书是无法完成的，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所有人对我的助益。不过最终，这本书还是由我写作的，无论是书中成功、正确之处，还是错误、遗漏、粗疏或者阐释、推论中存在问题的地方，全部都应由我承担。

最后，我的妻子 Joyce P. Kaufman（一位凭借自身能力而富有成就的学者）和我共同度过了那些常常是非常孤寂的著述时光，并在写作不顺利的时候给予对方爱、安慰和容忍。我们的黑色拉布拉多犬 Stanton 为了片刻的欢乐，总会安静地趴在书桌旁等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我们中的一个人站起来说：“一块儿出去走走！”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问题和视角	1
本书的安排	11
第二章 中国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聚落，公元前 1000 年以前	16
第一节 自然环境	17
第二节 人类聚落与史前史	30
第三节 史前的环境变迁	46
第四节 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公元前 4000 年— 公元前 2000 年	50
第五节 中国青铜时代：技术与环境变迁，公元前 2000 年— 公元前 1000 年	53
第六节 环境的变迁，公元前 1500 年—公元前 1000 年	62
小结	69
第三章 国家、战争与农业：上古及帝制早期中国的环境变迁， 公元前 1000 年—公元 300 年	71
第一节 国家、战争与上古时期中国的环境变迁，约公元前 1000 年—公元前 250 年	71
第二节 早期帝国的环境变迁，公元前 221 年—公元 220 年	99
第三节 古代中国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理念	120
第四节 早期帝国的尾声	129
小结	130